

# 诗人与自然之死

## ——关于梭罗与陶渊明的比较研究

鲁枢元

“自然之死”，是20世纪中期提出的一种说法，以后便不断得到论证与确认，代表性的专著有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记者瑞秋·卡森（R. 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70年代末美国生态哲学教授卡洛琳·麦茜特（C. Merchant）的《自然之死》，80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比尔·麦克基本（B. Mckibben）的《自然的终结》。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人们突然发现，原先的自然已不存在，天也不是原来的天，地也不是原来的地，风雨也不再是原来的风雨，江河也不再是原来的江河，鸡鸭牛马也不再是原来的鸡鸭牛马，甚至一年之中的四季、一日之中的昼夜也开始发生颠倒、紊乱。正如麦克基本所指出的：“风的意义、太阳的意义、雨的意义，以至于自然的意义都已经与以往不同”，“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于是我们正在使天气发生着改变，由于天气的改变，我们已经使地球上的每一个景点都变为人工的和虚伪的。我们使自然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意义。”<sup>1</sup>接着人们很快就发现，失去的不仅仅是外部世界的自然，还有人自身的自然，尤其是人性中的自然。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电子工程、基因工程的迅猛推进，电脑、手机、互联网、器官移植、基因再造、生物克隆等电子产品、生化产品滚滚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每天都在侵蚀、剥离、改变着人的自然天性，以及人在百万年来进化获取的种族属性包括人的感知路径、思维习惯、情感表达方式、话语活动方式、人际交往模式、人生价值理念等等。“自然的终结”同时意味着人类自然生成的天性的泯灭，“自然之死”也将化解掉人生固有的一切价值和意义。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 Scheler）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揭示：“作为生物，人毫无疑问是自然的死胡同”<sup>2</sup>已经拥有数百万年发展进步历史的人类，说起来仍然显得幼稚可笑：费尽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自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及其演替”（03bzw007）的中期成果。

<sup>1</sup> 【美】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44页、第55页。

<sup>2</sup> 【德】《舍勒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9版，第1376页

劳苦、费尽心机、突飞猛进的结果，在貌似空前鼎盛的这个现代社会中，不但把“自然”送进了“死胡同”，也把自己关闭到了这个“死胡同”中。

但舍勒同时提醒人们还有一线希望：人类作为“精神生物”，作为能够“神化自身的生物”，“人就不仅仅是死胡同；人同时还是走出这条死胡同的光明和壮丽的出口，是原始存在能通过他开始了解、把握、理解和拯救自身的生物。因此，人同时具有双重特性：死胡同和出口！”<sup>1</sup> 在人类文明史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来都有一些人在这道死胡同中徘徊摸索，寻觅着走向本真澄明之境的出口。到了二十世纪中期，随着“自然”的境遇愈加凶险，拯救自然、拯救人类自身的欲求遂酿成声势浩大的“生态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此前一百年的美国诗人、散文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917—1862）被奉为守护自然本真与人类本性的圣哲。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1949年由徐迟先生翻译介绍到中国，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82年由译者细加修订后再次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刊印发行，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最近十年中，差不多有十种之多不同版本的《瓦尔登湖》问世，似乎仍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瓦尔登湖遂成了中国读书界一道开阔、亮丽的风景，梭罗遂以他“自然主义诗人”、“生态文学家”的身份成为众多中国诗人、作家的偶像。

在20世纪晚期以其卓越才华和高洁人格辉耀于中国文坛的两位青年诗人海子和苇岸，都是梭罗的虔诚崇拜者，都曾经从梭罗那里汲取了回归自然清纯、守望人类本性的信念。海子说《瓦尔登湖》是他读到的最好的书，并写下献给梭罗的组诗；苇岸更是到了“言必称梭罗”的地步，在他那本薄薄的遗著《太阳升起以后》中，曾数十次讲到梭罗，有两篇文章是专以梭罗命题的。他说《瓦尔登湖》给他带来的精神喜悦和灵魂颤动，是其他作品所不能比拟的，“它教人简化生活，抵制金钱至上主义的诱惑。它使我建立了一种信仰，确立了我今后朴素的生活方式。”“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是梭罗的散文征服了他的诗歌，让他的文学人生“皈依”了梭罗。<sup>2</sup>

看到这些，我不能不坦率地说，我心头已经产生些许“醋意”，不是因为别的，是为了我们的陶渊明。

<sup>1</sup> 【美】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55页。

<sup>2</sup> 苇岸：《太阳升起以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版，第117页，第120页。

在西方那些现代社会的策源地，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工业化运动刚刚启动，就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卢梭、施莱格尔、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挺身而出为自然抗争，在抗争中显现出诗人的本真与良知。而在现代中国，在这块后进的一心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国土上，却一直很难听到发自本土的守护自然的声音。如今，自然之死的进程在我们的国土正在加速扩展，诗人的声音依然微弱。海子死了，苇岸死了。更加不幸的是，那位在一千六百年前去世的陶渊明在今天也已最终确切无疑地死去，不但身体死去、精神也已经奄奄一息。作为一位常年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我难以掩饰自己的失落

2008年秋天，我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在中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印度、波兰、法国等国家的学者面前发出呼吁，希望面对自然之死，发扬生态精神，在大力研究梭罗的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与梭罗，在时间上相隔一千五百年，在地域上分居东西两个半球，在种族上还明显地拥有“黄”、“白”两种肤色，然而面对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他们之间仍然拥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两个人的诗文中都写到“读书”、“种豆”、“锄草”、“采花”（采的虽然不一定是菊花）、看云彩、听鸟叫，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甚至还讲到“无弦琴”，即“宇宙七弦琴”，那是由森林上空的风“拨弄”松树的枝叶发出的天籁。当然，这只是字面上的贴近。往深处探讨，梭罗与陶渊明还有更多相似的地方。

**一、反对现行社会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文明进步”的怀疑，与主流社会拒不合作。**

在陶渊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决绝地辞去政府中的职位，同时也就逃出主流社会的各种管制和约束，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意志。对于梭罗来说，他本来多才多艺，当过记者、教师、测量员，甚至在制造铅笔上有专项发明，但他还是拒绝了一切公职，甚至拒绝了社会上认可的一切体面的工作，在民众的眼里几乎成了康科德城内一个不务正业的浪荡人。他拒绝向政府交税，抗议政府的蓄奴制度，还撰写了题为《消极抵抗》的论文，为此坐牢也在所不惜。他的精神上的抵抗甚至还推及刚刚起步不久的美国工业社会的各个方面，如铁路、银行、邮政、报业等。为此，梭罗曾被加上“反人类文明”的罪名。梭罗说，他热爱的是田野中的“鲜花”，而时代文明塞给他的却是工厂里的“钢锭”！<sup>1</sup>陶渊明在自己的

<sup>1</sup> 《梭罗日记》第七卷，第80页，转引自【美】罗伯特·米尔德：《重塑梭罗》，东方出版社2002版，第293页。

诗歌中坦言，他本性是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儿，时代向他展示的却是一只“囚笼”。如果说某个时代的社会体制总是一个时代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的话，陶渊明、梭罗的反体制倾向无异包含着对时代文明的审视和批判。如果不是一边倒地站在“体制”的立场上，他们二人对体制的抵触与冒犯不能说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 二、退避山野，返身农耕，在自然中寻求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支撑。

陶渊明的退隐归田、委运化迁，被认为深得中国古代哲学的精义与神韵，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成为为历代诗人模仿效法的典范。凭心而论，身处工业时代上升时期美国社会的梭罗，要想挣脱时代大潮的裹挟，返身农耕与自然，比陶渊明的回归田园更其为难！然而，在1845年开春，28岁的梭罗拎了一把借来的斧头，毅然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自己动手盖房、开荒，开始了他自然主义诗学的实践。他的口号一如陶渊明的“任自然”：让生活像自然一样常新，“跟大自然自己同样简单”，“同样的纯洁无瑕”，“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sup>1</sup>他在森林中种豆、砍柴、捕鱼、采集野果，换取生活中最低限度的温饱。在主观取向上，梭罗的“退”与“返”甚至更为决绝，他不但要从工业化的、市场化的时代抽身而退，甚至还要从当下的农业生产方式退回更远古、更简单同时也更“自然”的原始农耕时代。他认为原始农业与自然有着更亲密的关系，因此也就更具有“神”性。原始农事“曾经是一种神圣的艺术”，“从事耕作的人过的是一种虔敬而有用的生活，只有他们才是农神的遗民”。<sup>2</sup>后世农业生产的发展其实已经蜕化质变了，只“把土地看作财产，或者是获得财产的主要手段”。由于现代人的贪婪与自私，大地上农耕的风景已经被破坏了，“农事跟我们一样变得低下，农民过着屈辱的生活”。梭罗认为人不应为物所役，不必为了攫取更丰厚的利润去拼命劳作，而应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与自然的交流与融合，在与自然的交流融合中享受天地间最高的精神愉悦。在《瓦尔登湖》一书中，他用优美的诗歌语言记叙了他在“疏懒”、“宁静”、“充实”、“优美”中度过的一天：

在一个夏天的早晨里，照常洗过澡之后，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

<sup>1</sup> 【美】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82页。第90页。

<sup>2</sup> 同上，第156-157页。

宁静之中，凝神沉思，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或默不作声地疾飞而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我在这样的季节中生长，好像玉米生长在夜间一样，这比任何手上的劳动好得不知多少了。这样做不是从我的生命中减去了时间，而是在我通常的时间里增添了许多，还超产了许多。我明白了东方人的所谓沉思以及抛开工作的意思了。<sup>1</sup>

梭罗在这里体会到的，其实就是老庄哲学中“致虚静，守静笃”，“平易恬淡、乃合天德”，让人生顺应自然的精神；其实也就是陶渊明诗句中“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移”、“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境界。陶渊明确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梭罗则写道：“你瞧，现在已经是晚上”，一天里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说，我只静静地微笑，笑我的幸福无涯。”<sup>2</sup>在这里，梭罗似乎已经感悟到“与天合其德”、把自己同化于自然之中，才是生命中最有意义、最美好的事。然而，现代社会的进步正背离这一原点愈行愈远。

### 三、持守清贫，以清贫维护生命的本真、生存的自由、灵魂的纯洁。

陶渊明自41岁上弃官归田之后，生活一天比一天贫困，几乎沦落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

《五柳先生传》中所写的“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其实就是他的自我写照。以今天的生活标准看，陶渊明晚年忍饥挨饿、朝不虑夕的日子已远在“贫困线”之下，然而这并没有败坏他旷放淡定、真率洒脱的心情，“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语），仍能催发他创作出更好的诗篇。其原因是陶渊明有更高的信念，即“清贫”与“素朴”是“得道”的必由之路，是一个人回归自然、回归本真时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梭罗没有贫困到衣食无着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木屋里，是在有意识地体验贫困，竟也清理出许多关于清贫的道理。在他看来，康科德城中的人们辛辛苦苦、千方百计地渴求发家致富，等于生活在“别人的铜币中”，“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葬掉了。”<sup>3</sup>这就好比一片泥沼，人们深陷其中，挣扎一生。即使目的达到，付出的却是生命的独立与自由，是一个人可贵的天性。梭罗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得保全的。”梭罗

<sup>1</sup> 【美】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106页。

<sup>2</sup> 同上。

<sup>3</sup> 同上书，第5页。

指出：“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须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sup>1</sup>大笔钱财能买来大批奢侈品，却买不来高尚的德行。“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sup>2</sup>更何况一些人的富裕差不多总是要建立在另一些人的贫困劳苦之上。在陶渊明那里，生活中难得的舒适与享受，如“夏日北窗高卧。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反倒是一分钱也不用花的。在《瓦尔登湖》中梭罗一再声称：面对大自然，穷人与富人本是平等的，“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上，像射在富户人家窗上一样光亮；在那门前，积雪同在早春融化。我只看到，一个安心的人，在那里也像在皇宫中一样，生活得心满意足而富有愉悦的思想。”他说，“城镇中的穷人，倒往往是过着最独立不羁的生活”。<sup>3</sup>陶渊明其实也正是为了“独立不羁”，才选择了贫穷的生活。梭罗似乎看透了这层意思，他说：“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有不过。”<sup>4</sup>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 四、崇尚精神自由，自做精神主宰，善于以生命内宇宙的充实替补对外部物质世界的索取；为了更高理想，不惮于超越现实营造空中楼阁。

对于陶渊明来说，这是“肆志无窳隆”、“心远地自偏”，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是一种任心适志、无论穷通的达观心态，是一种道家哲学意义上无持无待的逍遥游，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一种超越现实遨游于虚幻之境的浪漫主义精神，是人间难觅的桃花源。对于梭罗来说则是那种力排众议的自信，无畏无惧的孤独。“物尚孤生，人固介立”，陶渊明归田后曾表示“息交绝游”；梭罗则一再表示“社交往往廉价”，而“寂寞是有益于健康的”，“我爱孤独。我没有比碰到比寂寞更好的伙伴了”

“太阳是寂寞的”，“上帝是孤独的”，“我不比一张豆叶，一枝酢浆草，或一只马蝇，或一只大黄蜂更孤独”。<sup>5</sup>一般人难耐孤独，是因为外需外求太多，圣人与大自然都不惧孤独寂寞，是由于内在的充盈，因为他与它们是能够自持自足的，能够在精神上、心志上自我支撑、自我坚守。梭罗宣称：“上帝将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只要我还能思想

<sup>1</sup> 【美】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07页。

<sup>2</sup> 同上书，第12页。

<sup>3</sup> 同上书，第306页。

<sup>4</sup> 同上书，第12页。

<sup>5</sup> 同上书，第129页。

世界对于我还是一样地大。”专心致志才能给生命留下更多的空间，他援引孔子语录以增加论辩的力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sup>1</sup>，算是活学活用，倒还比较贴切。在论及内外关系时他还说过：“你的衣服可以卖掉，但要保留你的思想。”衣服是外在的，可有可无；思想却是内在的珍宝，必须坚守秘藏，其意蕴与老子说过的“被褐怀玉”（《老子》第七十章）大致相似，同属内家功夫。梭罗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表露，他寒酸得实在一无所有，对于社会也没有什么有效的作为，他希望自己做的，是“在贝壳中培养出珍珠来”，“我含蓄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sup>2</sup>《瓦尔登湖》终于成了他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文学明珠。《瓦尔登湖》的确是梭罗自我内心精神修炼的结晶，一座用诗一般的语言文字营造的“空中楼阁”。他在此书的结束语中写道：“至少我是从实验中了解这个的：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行进，努力经营他所向往的生活，他还是可以获得通常意想不到的成功的。他将要越过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他将要有一些事物抛在后面；新的、更广大的、更自由的规律将要开始围绕他，并且在他的内心里建立起来……如果你造了空中楼阁，你的劳苦并不是白费的，楼阁应该造在空中，就是要把基础放到它们的下面。”<sup>3</sup>梭罗的“空中楼阁”，陶渊明的“桃花源”，都不过是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学想象对现实社会存在的超越。

### 五、他们在各自民族的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

处于不同时空、不同种族的陶渊明与梭罗，他们都在“种豆”、“锄草”的时候收获了文学上的庄稼。他们种下的不仅仅是豆子，黄豆或豌豆，同时也种下了他们各自的德行、旨趣、情志、理想，因而他们也收获了散文、收获了诗歌。他们的诗文犹如田野上的花朵、树林中的鸟鸣、天上的白云、山间的溪水，是属于自然的，属于农耕时代的，属于一颗质朴、真率的心灵。梭罗说过，田园风光中最珍贵的还不是丰硕的收成，而是“诗意”，要靠诗人精心提取。只是由于时代的错位与个人气质上的差异，陶渊明更钟情于田园，梭罗则更倾心于荒野，陶渊明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的宗主，梭罗则开创了美国文学史上“自然随笔”的范例，两人分别为世界文苑贡献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文体。

以上五点大体归纳了梭罗与陶渊明的相同或相通之处。他们之间当然也还存

<sup>1</sup> 【美】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07页。

<sup>2</sup> 转引自《瓦尔登湖》，徐迟“译序”，第11页。

<sup>3</sup> 同上书，第302-303页。

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还不只是表现在一位终日与酒相伴，一位滴酒不沾；一位儿女成群，一位终生未娶；一位主要写诗也写散文，一位主要写散文也写诗歌。

首先不同的是他们各自面对的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在中国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所要逃避的是腐朽的门阀氏族制度、虚伪的名教典章对人的本真天性的约束与戕害，是频仍无端的战乱给人生带来到苦难与凶险，陶渊明的退隐与回归多少带了些“圣人韬光”、“贤人遁世”的无奈。而生活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人梭罗，面对的是汹涌澎湃的工业化浪潮对传统农耕社会的全面冲击，是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对人的心灵的物化，人心与自然环境同时遭遇现代化的胁迫。梭罗走进瓦尔登湖畔的山林之中，不是逃避，不是退隐，而是在做一场“实验”，甚至是为了取得例证向现代社会奋起挑战。梭罗在潜入自然的时候心有旁骛，因此他不总能做到像陶渊明那样静穆、悠然，他的文字中更多了些愤激焦灼、抗争、驳难，有时不免锋芒毕露，像一位十九世纪的“愤青”。他在推行自己的观念时甚至写下这样的句子：“必须先把人们透过一个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不再能够用两条腿直立……要不这样做什么努力都是白费。”<sup>1</sup>梭罗给人的印象是在素朴的、圣人的形象上又添加了些“救世英雄”的光辉，陶渊明顾及的只是自救与救心。梭罗毕竟是一个西方人，一个美国人。

也许仍然基于东、西方的差异，在走近自然、同化自然的过程中，二人的途径也存有明显的差别。梭罗虽然被西方学者冠以“超验主义作家”的名号，但在通往自然真谛的道路上他仍不得不时时借助理性，借助知识，乃至借助运算，如他在“冬天的湖”一章中表现出的精细的测量技术。在通往自然的秘奥时他还不能忘掉借助“梯子”。而东方的陶渊明通过感悟则往往“一步登天”，他可以在浑然不知的心境中达成“天人合一”，使自己的身心完全融会于自然，这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境界。可不可以这样说：“云无心以出岫”——陶渊明“无心”却使自己成为了“陶渊明”；“掂把斧子进山林”——梭罗“奋力”终使自己成为了“梭罗”。

“无心”也好，“奋力”也罢，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两个人差不多都达到了先知先觉的“圣人”境界，并受到各自民族的认可与尊重。遗憾的是

<sup>1</sup> 【美】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22页。

他们钟情的“自然”至今并未因此得救。在陶渊明撰写他的《归去来兮辞》（公元405年）一千六百年之后，在梭罗撰写他的《瓦尔登湖》（公元1849年）一百六十年之后，“自然”终于还是无可挽回地沦落到濒死的边缘。更为悲惨的是：死去的不但有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界，也还有人心、人性中那质朴、率真的“自然”。

是谁谋害了“自然”？把“自然”送进了死地？对于发生在人类文字记载的这段历史来说，尤其是对于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工业社会300年来说，似乎找不到第二个理由，唯一的“嫌疑犯”是人类，是人类的文明。或确切一点说是人类文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那些主流意识。2007年春天，在中国科学家协会举办的“高科技的未来：正面与负面影响”的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的董光璧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谋昌教授都明确提出人类文化本质上是反自然的观点：一切文化都反自然，没有一种文化不是反自然的。对于这个命题，我认为应当做出一些限制性的补充：一是应将“文化”更换为“文明”，以突出人类文化中“物质性”、“体制性”的部分；二是并非人类文化的全部都是敌视自然的，而是在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那部分文化，应对自然之死负主要责任。在人类的文化中，尤其是人类的精神文化中，毕竟存在着如像陶渊明、梭罗这样站在自然的立场上，全力维护人与自然协调的诗人、文学家。也正是这些人，身体力行地对人类文明进行着不懈的反思与批判，维护着自然的整全与完美——哪怕仅仅是在一个文学想象的虚拟空间里！

面对自然之死，诗人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得到重新评估。海德格尔曾把这个自然濒死、人性沦落的时代称作“贫乏的时代”，有时也把它称作“危险的时代”。他坚信“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拯救”，而拯救的希望正在“贫乏时代的诗人”。“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sup>1</sup>按照金岳霖先生在《道、人与自然》一书中的解释。汉语文化中的“自然”，即是天地自然，也包括人性中的自然，几类于西方的“神”。<sup>2</sup>诗人们吟唱着去寻觅远逝的诸神的踪迹，就是在寻觅自然、呼唤自然、守护自然，为濒死的自然招回远逝的灵魂。

回望人类走过的历史进程，那些崇尚自然、吟唱自然的诗人，那些崇尚自然同时又在对抗、批判着人类文明的诗人，那些批判着人类文明同时又不得不悖逆

<sup>1</sup> 【德】《海德格尔选集》上册，孙周兴主编，三联书店1996版，第410页

<sup>2</sup> 参见金岳霖：《道、人与自然》，三联书店2005版，第151页

历史发展向往着退隐、回归的诗人，已经获得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决不仅是一种闲情逸致，那还是人类渴望在精神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境，是一种在诗意中栖居的生命存在方式；梭罗在瓦尔登湖上的守望也不只是对湖光山色的迷恋沉醉，那还是发自人类天性幽微之处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是对于人类前途、人类最高幸福的憧憬。

当然，这里所说的诗人不仅仅是陶渊明和梭罗，还有海德格尔引为同道的里尔克与荷尔德林。甚至也不仅仅是那些写诗的人，还应包括一切诗性未泯的人包括那些拥有诗性的小说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家及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或许，一些最富有良知的科学家与政治家也会加盟到诗人的行列中。是否可以这样期待到了葱茏的诗意滋润了人类中大多数心灵的时候，人类文明或许将获得新生，自然也就有救了。